



人

文

中

国

书

系

江西出版集团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近代中国 启蒙思想 研究

◎林启彦／著



人

文

中

国

书

系

近代中国启蒙思想研究



江西出版集团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中国启蒙思想研究/林启彦著.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8.8
(人文中国书系)

ISBN 978 - 7 - 80742 - 349 - 2

I. 近… II. 林… III. 思想史—中国—近代—文集 IV. B25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4390 号

出版者 江西出版集团·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邮 编 330006

电 话 0791—6894736(发行热线) 0791—6894790(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E-mail bhz@bhzwjy.com

书 名 近代中国启蒙思想研究

作 者 林启彦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厂 址 南昌市民营科技园民营大道 69 号

开 本 32 开 850mm × 1168mm

印 张 15.375

字 数 38 万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80 元

ISBN 978 - 7 - 80742 - 349 - 2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自序

这本论文集，选录了笔者过去三十年间在中国大陆、香港及台湾三地学术期刊上所发表的部分论文。蒙北京大学欧阳哲生教授推荐与张国功先生的支持，得以列入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人文中国书系”之一，殊感欣悦与荣幸。

在我过去的教研究生涯中，早年的学术研究兴趣主要集中于中国近代政治思想方面，特别关注西方近代民主政治理论传入中国以来，对中国知识分子民主主义思想萌生与发展所起的作用与影响的问题。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其后结集成《步向民主》一书，作为总结。踏入90年代，我的研究重心转向中国近代化的课题，尤其对晚清至民国期间两个活跃的知识群体的近代化启蒙思想的组成与特点，深感兴趣。其中第一个是以香港为活动基地的知识分子，他们有关中国近代化改革方案的各种建言与构思，是值得深入探讨的。另一个活动空间更广，兼有留英或留日学习与生活经验的知识群体，他们在面对异质文化的重大挑战，及受到西方自由主义与议会宪政的洗礼与冲击后，在民族文化认同方面，以及对近代学术文化与政治建设所持的立场与取向，同样值得加以考察。就这两方面的问题，我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我在一系列的论文中，探讨了由晚清到民国初期，这两个知识群中的一些代表人物，他们的近代化启蒙思想的方方面面。我发现，他们的思想与理念自成一局，独具特

色,与稍后涌现于五四时期、以激进姿态批判传统为主调的启蒙思潮,先后辉映。概言之,在中西新旧文化的冲突与交汇中,我所选择的这批知识分子像王韬、何启、严复、章士钊等,他们都有了一套既可立新而又不必彻底破旧的文化转型观念;在自由主义的两大传统(英式与法式)之间,宪政民主实施的前提——人与制孰重的问题上,这批早期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如严复、章士钊等,早已洞悉其要义,并作出了可行的抉择和有意义的折中;在民族立国与国防外交的建设上,我们亦可以找出像留日知识群中的陈天华、杨笃生、章太炎、孙中山、严复与王韬等思想家务实适时而又深具远见卓识的民族融和观与以追求战略优势为目的的近代国防外交观。即使在对未来理想世界的建构方面,晚清的知识群体大抵亦能往来于中西文化之间,吸收二者的思想资源,作出妥善的调融,使得中国当代的大同思想仍有丰富的传统思想意蕴。以上这些考察与发现,对了解先于“五四”出现的一股带有启蒙性质的中国近代化革新思潮的基本内容,当有一定的帮助。

为了适当地和较有系统地反映我这十多年来对上述这些主要思想史问题的研究成果,我在本书中选出了二十篇论文,分为三组。

第一组的论文,以《步向民主》一书部分的选文为基础,加入了《戊戌时期维新派的大同思想》、《20世纪初留日知识界的民族主义》与《辛亥革命与章士钊——由激进到稳健的政论家》,题作“近代中国政治思潮”,用以透视近代中国三股重要政治思潮,即民主主义、民族主义与大同思想出现初期的脉络,以对晚清以来政治思想发展的多源性与多样性,作出较完整的析述。

第二组的论文共选六篇,主要是90年代以来的作品,题作

“孙中山、王韬与香港知识分子”。其主旨在于集中探讨香港地区孕育的一群知识分子的近代化富强思想的内容,以孙中山、王韬、何启、容闳等人的近代化启蒙思想为代表,研究他们在近代政治、军事、海防及文化等多方面的先进观念,从而论述他们的近代化建设的思想蓝图。他们都显示出较内地思想家更为开阔的改革胸襟,且皆善于熔铸古今中外学术思想的精粹于一炉,充分体现出一划时代的创新精神。

第三组的论文选了七篇,题为“严复思想新诠”。严复是我自90年代以来一直最为着力研究的思想家。严复作为中国第一代自由主义的代表者,分析其思想与何启、章士钊(同属英式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二人之间之异同,最能看出严复思想的特质。这组论文是对严复启蒙思想作整体性的考察,对其近代化的思想模式、古典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民质改良观、文化融合说以及国际关系论等进行新的诠释与整理,从而对严复在近代思想史上的卓越地位作出客观的评估。严复的一套近代化思想体系,提出了一种可能的方式与途径,以消融传统与近代、激进与保守的相互对立的关系,以理性稳健的态度,建构出一个现代国家精神文明的坐标,足以作为近代中国思想新传统的重要基石。

“五四”以来的中国社会思潮所趋,在民族国家救亡的大前提下,打倒传统、拥抱西方已变成了无可阻挡的狂澜。“五四”勃兴的启蒙思想急促地意识形态化,使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迅速趋于狭隘与极端,造成知识群体的严重决裂。这对建设健康的近代中国新文化,其破坏性的作用远远超过其所曾带来的积极影响,史家对此早已有精湛的论述。重新建构一套多元化的、开放的,而又立足于自身优秀文化传统基础之上的中国近代化文明思想系统,仍是我们今日所应努力以赴的目标。今日回

◆近代中国启蒙思想研究

顾晚清至民国前期一批曾受西方特别是英国文化熏陶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学者所曾宣扬的一系列旨在促进传统向近代文明社会转型、过渡的启蒙思想观念,当有一定的参考借鉴的价值。

我过去多年学术的钻研,实抱着希望能解答这一个文化重建的问题的意识而展开的。这本论文集,无疑是我个人过去对此问题所作的一番学思努力的记录。我愿意把它拿出来与一同关心有关问题的学者同行分享切磋,借以收抛砖引玉之效。

三十年的教研究生涯,在我的人生中,仿佛一瞬之逝。回忆昔日追随多位学者贤师求学问道之情景,依然历历在目。最使我感到歉疚的,是两位曾对我亲切教导和多方扶掖的老师王德昭教授与横山英教授,生前对我期望至殷,如今均已仙逝。谨借本书的出版,聊以安慰他们两位老人家在天之灵。

林启彦

于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

2007年6月8日

目录

自序/1

第一辑 近代中国政治思潮

洋务运动时期(1861~1894)的议院论/3

戊戌时期维新派的大同思想/23

卢梭《民约论》的传来及其对清末政治思想的影响/52

清末留日学界的民权思想/100

20世纪初留日知识界的民族主义/118

辛亥革命时期的共和宪法/138

辛亥革命与章士钊——由激进到稳健的政论家/160

第二辑 孙中山、王韬与香港知识分子

辛亥革命前孙中山的民权思想与《民约论》/191

孙中山论政党政治/216

孙中山的海防建设思想概观/232

王韬的海防思想/246

王韬中西文化观的演变/262

清季中国的近代化运动与香港知识分子/287

第三辑 严复思想新论

严复与何启——两位留英学生近代化思想模式的探讨/303

论严复的保守思想——《政治讲义》的一种剖析/325

民国初年严复尊孔与重儒的思想——“新民德”观的探讨/347

严复与章士钊——有关卢梭《民约论》的一次思想论争/359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严复的国际政治观——参战思想的分析/395

五四时期严复的中西文化观/420

论严复思想的价值与贡献/441

代结语 近代中国早期自由思想的再思/461

附录 林启彦著述要目/478

第一辑

近代中国政治思潮

洋务运动时期(1861 ~ 1894) 的议院论

一、引言

近代中国人,正式接受西方近代民主政治中的议院观念,是从洋务运动时期才开始的。

洋务运动时期萌兴的议院论,就是这些政治观念的具体内容,它在近代中国民主思想发展的历史中,实占一席相当重要的位置,然却往往为人所忽略。

本文拟对此时期的议院论,作一较系统、全面的整理,以期为此政治观念之兴起及发展的历程,勾画出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

二、19 世纪 60 年代冯桂芬提出“君民不隔不如夷” 论题的重要意义

19 世纪四五十年代,由于社会发展的条件所限,林则徐、魏源等人虽积极提倡认识和介绍西方先进国家的政情与历史,且亦间有对其民主政制表示初步的一番赞美和向往之情,但他们

却都没有对中国传统政制表示怀疑和扬弃。^①他们所能接受和承认的是西方国家的“长技”，且也认为他们的“长技”当为中国所师法。然而这些观点，在当时来说，还只属于极少数开明的知识分子的看法。

经历太平天国的动乱和英法联军之役的惨败，清朝政府中若干当政者及社会上较多知识分子，都受到很深刻的刺激和教训。他们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的弊病所知日益加多，而向西方国家求知讨教的意念亦逐步增强。终于在朝野上下，产生了一批人物，他们一面既肯承认中国的弱点，一面更愿意向西方列强学习其长处，并进而推动了洋务运动。他们认识到要抵抗外国的侵略，要国家富强，唯有“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一途。于是在60年代起至90年代中期，办洋务的活动便成为中国社会最重要的改革事业。这些活动的基本目标是向西方列强学习船坚炮利之法及其开源强兵之方。由于社会上这股西化的潮流不断地激荡，在知识界和思想界中，更有些人进一步从事中西政教的探讨和比较，从而对西方国家的民主政制，已能从林则徐、魏源的介绍和赞赏的层次，提高到薛福成、马建忠的对中西政制作平行比较和检讨的阶段；从龚自珍对中国封建政治体制的批判进展到郑观应、陈炽等所提出的向西方民主国家学习和仿效其议院制的建议。这种演变，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是有重要意义的。

对中国政治制度首先意识到其落后性的是19世纪60年代撰写《校邠庐抗议》一书的冯桂芬。他为探求民主政治的理想踏出了第一步，由他开始了中西政制优劣的探讨工作。他在《校邠庐抗议》中，不但继承了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论

^① 参看陈胜彝《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和介绍》（下）一文，《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2期，第32～44页。

点,坚持学习西洋的科技文化,而且首先提出了西洋政制优于中国政制的命题。由于他所处的时代,使他能有较多的机会接触西方国家近代的知识和学术文化,故对于中国的封建君主制和西洋国家的民主制的优劣,他便有较前人更切实的认识。他一方面指责封建君主制的祸害,是坐令一种是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的暴政横行。他说:

三代以下,召乱之源,不外两端,下所甚苦之政,而上例行之,甚者雷厉风行以督之;下所甚恶之人,而上例用之,甚者推心置腹以任之。于是鸾鸩可以不分,鹿马可以妄指,沸羹可以清宴,嗷鸣可以嵩呼。五尺童子皆以为不然,而上犹以为然。^①

另一方面,他又提出了一个相当惊世骇俗的论断,认为中国已非天朝上国,而实际上在很多方面落后于西方列强。他指出中国和这些国家比较的话,情况是:“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②这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他所说的“君民不隔不如夷”之论,这似乎意味着他已了解到中西政治制度存在着彼优此劣的事实。不过,他对中国“君民相隔”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却相当保守。他只希望谋求在君主专制的统治下,做些可以沟通上下意见的改革而已,并非要变更中国固有的政教,以及采纳西方的民主政制中的某些措施来消除中国君民的隔阂。他的态度和立场很明显,他曾说过:“如以中国伦常名教为

① 冯桂芬《复陈诗议》,《校邠庐抗议》(台北:学海出版社影印本,1967),第106~107页。

② 冯桂芬《制洋器议》,《校邠庐抗议》,第155页。

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哉?”^①他又相信,一切政治问题,只要贤君在位,并得人才辅佐统治,即可解决。他说:“世之盛衰在吏治,治之隆污在人材。”^②这个盛衰隆污的关键,全在于君主的德与不德。他认为“唯皇上振刷纪纲,一转移间耳”^③。所以他的立场,其实不出传统中国民本主义者的观点。他虽然并非没有对西方民主政治的知识,但他所追求的仍只是圣君贤臣式的封建统治。所以他和稍后一些主张有限度地采纳西方民主政制的知识分子比较起来,实在相当温和保守。他无法摆脱圣人之治和封建社会的纲常名教。所以他虽然发现了“君民不隔不如夷”的事实,却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的有关民主改革的建议。

冯氏总结了四五十年代先进知识阶层批判现实政治及寻求改革的思想,并有若干的发展。他较魏源更进一步,除了提出要从西方先进国家输入坚船利炮之外,更要学习其坚船利炮背后的基础科学及知识技艺,以期达到科技的自主。他同时亦明确地承认中国政治有不及西洋诸国之处,尤其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关系的悬隔。不过,他本人却是一个典型的中体西用论者,因此他就不能同意中国在政治制度方面有向西方国家学习的必要。所以,在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孳生过程中,冯氏的作用,还不能算有很积极的作用。

① 冯桂芬《采西学议》,《校邠庐抗议》,第151~152页。

② 冯桂芬《自序》,《校邠庐抗议》,第5页。

③ 冯桂芬《制洋器议》,《校邠庐抗议》,第155页。

三、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中期郭嵩焘、薛福成、马建忠等人的议院思想

19世纪60年代冯桂芬提出了简单的“君民不隔不如夷”的重要论断,开启了70年代知识分子对中西政教作比较的先声。随着对西洋政教的了解和认识的加深,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发现西方富强之源在于政教,而最后则归结为议院制度之存在所致。

6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中国政府中有一批人因充任驻外使节,而能有机会亲身经历西方政教之善。这些中国人对西方的政治制度,不但能以平实客观的态度去认识,而且更以之与中国政教相比,进而修改了他们对传统政教的若干偏执之见。郭嵩焘、薛福成、马建忠等人可为代表。

郭嵩焘是清廷派驻英国的第一位公使,同时也是中国第一位驻外使节。他在思想上虽多不出洋务派的基本范围,但却能认定西洋政教风俗之美,有其本源所在。他指出西洋诸国富强之原,在于其政教之修明、人民的富裕自足,故他认为:“盖兵者,末也。各种创制,皆立国之本也。”^①他明白,西国之强,并非强于兵,而是强于政制。他认为中国的留学生应学西洋的法律和经济之科,才能掌握富强的钥匙。^②

薛福成对西方民主政制的认识,又出郭嵩焘之上。他不但承认西方政教优于中国,而且特别提出西方民主国家的议会制

① 转引自周弘然《中国民主思想运动史》(台北:帕米尔书店,1964),第78页。

② 转引自周弘然《中国民主思想运动史》,第78页。

度是国家强盛的关键。他对英国的两党制的议院政治,称赞不已。他说:

(两党——引者注)……迭为进退,互相维制……一出一入,循环无穷,而国政适以跻乎平。^①

他并察觉到,随着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必须不断改革。他认为君主制度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必然要向民主制度过渡。他说:

俄之国政,穷久亦必改变,与英、法、德诸国相同。^②

他虽指俄国而言,实际暗示中国的封建君主制度也不可能长期不变。在欧美诸国的政制中,他似乎对英、德的君主立宪比较重视和欣赏。他说:

西洋各邦立国规模,以议院为最良,然如美国则民权过重,法国则叫嚣之气过重;其斟酌适中者,唯英德两国之制,颇称尽善。^③

马建忠曾被洋务派官僚派往法国留学,系统地学习过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法律理论,对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制原理有较深入的

① 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第165~166页。

② 薛福成《论俄罗斯立国之势》,《庸盦全集》(台北:华文书局影印本,1971)(一),第347页。

③ 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第134页。